

## 書 評

呂 妙 芬\*

**Chang Woei Ong**

***Men of Letters within the Passes: Guanzhong Literati in Chinese History, 907-1911***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8, xiv+262 pages, ISBN 978-0-674-03170-8

本書有很明確的問題意識，主要透過對關中地方士人文化的個案研究，檢視並回應韓明士（Robert Hymes）所謂從南宋開始有地方主義興起的現象，並與其他地區的個案研究比較。因此，閱讀本書最好同時閱讀韓明士對於江西撫州的研究，以及作者王昌偉的業師包弼德（Peter Bol）教授一系列有關唐宋變革、北宋士人文化、地方史與地方認同的作品，及其他不同地區之地方文化史的專著。<sup>1</sup>王昌偉顯然非常熟悉這些論著，並具有極類似的問題意識，行文之間也經常呼應或比較上述的研究成果。故本書可視為北美學圈以包弼德為主，強調學術思想與地方史結合之研究取徑的一種成果展現。

全書涵蓋非常長的歷史，從五代一直到二十世紀初期。作者幾乎遍閱

---

收稿日期：2009年8月25日，通過刊登日期：2009年10月21日。

\* 作者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Lu Miaw-fen is an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in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t the Academia Sinica.

1 這些作品及其他相關研究，詳見王昌偉書後的引用書目。

尚存的關中重要文人著作及關中地方史料，以幾組分析權力和認同的關係概念，如全國與區域、官方與非官方、中央與地方等，試圖說明中國歷史上不同時期的關中士人，對於朝廷政治體制、士人職責、中央與地方之關係、參與地方事務、自我定位與地方認同等看法與表現。藉著這個個案研究，作者也試圖修正部分過去學者對關中史的認知，並與其他針對中國南方地方史研究的成果進行比較，也進一步豐富學界對中國西北地區的知識。

王昌偉主要以朝代分期，將全書分為三大章。第一章為五代、北宋時期，作者首先指出關中在經歷唐宋變革後並非持續地衰微，其實在北宋時期，人口和經濟均有成長，也有新的士族遷入，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和發展。而關中特殊的戰略地位，使得該地行政組織及與朝廷的關係，均有別於南方地區；關中士人對於軍事防禦的重視，也更勝於南方士人。接著，討論唐代世族衰微、北宋新興士族在關中的情形，並考查北宋關中士人對於理想政治體制與地方參與的看法與實踐。張載學派是本章的重點，作者詳細討論了張載之學，包括其以天下為一家的政治秩序觀，及如何落實三代之治的看法，也說明張載門人呂氏兄弟推行鄉約的活動與意義。簡言之，雖然十一世紀末期關中士人參與地方事務的能見度提高了，不過在關中士人的理想政治藍圖裡，「朝廷」與「官方」始終佔有重要、不可取代的地位。

第二章討論金、元時期。從這一章的書寫我們可以發現此時期關中文獻相當少，作者雖然試圖追索一些大家族的歷史，但均因缺乏史料而必須作罷，故只能簡介幾位較著名的士人，如楊奐、李庭、同恕、蕭𣪖。此時期雖有理學存在的身影，但內容不豐，而且很快便衰微。另外，關中是全真教大本營，全真教道友有些地方活動，但並沒有表現出明顯的地方意識。故作者稱金、元時期的關中，是一個地方學術文化中斷，沒有明顯地方意識的「黑暗時期」。

第三章處理明、清時期，也是關中文化的復興時期。由於本章涵括從明到二十世紀初，作者先概述此時期在人口、經濟、社會、政治各方面的重要發展，接著較詳細地說明三原溫氏、同州馬氏兩大家族能夠持續維持的原因，並以此與其他南方宗族研究略作比較。本章後半基本上是關中學術史，由於明代中葉以降，關中有明顯理學復興的跡象，關學的建構與文人書寫都表現出明顯的地方意識，作者也詳細討論了明中葉以後不同世代關中士人，

包括王恕、呂柟、胡侍、韓邦奇、康海、馮從吾等，對於地方認同的表現差異，以及他們如何看待、運用北宋大儒張載所留下的文化遺產。進入清代以後，作者主要討論李顥、楊屺、李元春、劉光蕡四位不同時期的關中士人，說明清初關中學術除了道學，又加上對政治經濟的重視，體現實學的精神；李元春時代見證了畢沅以地方官的身分帶入江南考證學，重修關中史並批評關中本地文化表現的情形，關中士人也試圖回應、反駁；清末的劉光蕡則明顯處於西方列強與西學的強大壓力下，在其論述中，關中及其農桑傳統與紡織業，不僅代表周文化的遺產，也成為中國抵禦「外夷」的資產，此時的關中文化論述也突破地域限制，與全體中國存亡緊密相關。

就關中地域文化、士人地方意識與認同的研究而言，本書是相當成功的個案研究。不僅提供我們長期歷史變化的趨勢，作者也在廣泛閱讀文獻的基礎上做出細緻的解讀，並在明確的問題意識下，與其他區域研究成果進行比較，標舉許多關中的特殊性。整體而言，作者對於明代的處理最為成功，此可能與豐富的史料以及晚明關中士人明確的地方認同有關，史料與作者的問題意識配合得宜，討論也最精彩。但作者對清代的處理過輕，全書僅在第三章後半，以簡述幾位學者的方式來交代整個清代的關中學術史，份量較為不足，雖然作者努力扣緊士人的地方認同來書寫，但仍只是蜻蜓點水式地觸及，以現存史料而言，清代應可以有更多的發揮空間。

最後則是關於分析的框架，作者選擇「官方與非官方」、「中央與地方」做為分析的焦點，關注點顯然放在權力關係的對立與張力面，儘管作者也不忘指出，除了對立，尚有彼此涵攝、和諧合作的面向。雖然從對立的權力關係著手分析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確實能提供我們重要的洞見和解釋，不過我們仍不禁想問是否有更貼近傳統中國政治秩序觀的分析可能性？尤其作者也注意到在張載等士人的政治理念中，「家」是非常重要的意象。許多學者都指出，傳統中國具有一種家國同構、忠孝同質的政治秩序觀，「家」不僅是社會結構之基礎、發揮著政治治理與穩定社會秩序的功能，也是理想政治社會秩序的原型，「國」是「家」的延伸與推展。在這種家國同構、由「家」向外層層推致的政治秩序觀下，「家」的政治職能與公私性質往往不是截然分明的，而是需視情境與相對關係而論；和諧的上下關係、合作的中央與地方關係也是理想政治秩序的藍圖與政治論述的重點。當然，在這樣的政

治理念下，權力競爭與張力仍是存在的，只是表達的手法與運作的模式都必須扣合此特殊的政治意識形態。舉例而言，朝廷對地方或大宗族授權，具有籠絡收編、下貫朝廷控制力的政治功能，但也有不能控制的風險；地方對朝廷的尊崇與配合，同時具有順服、承認權威，以及利用朝廷權威以壯大自己的可能。重要的是，雙方都運用著同一套家國同構、和諧理想的政治修辭。如果從這個角度看張載等關中士人對理想政治的論述，應可以讀出屬於中國傳統特殊政治意識形態的意涵，而適當加強對此特殊政治意識形態的說明，應會使全書的分析更具歷史感與層次感。